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四辑）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英〕马林楠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原著 李安宅 译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 · 哲學（第四輯）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

〔英〕馬林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原著 李天綱 譯述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819-6

I. ①巫… II. ①李… III. ①巫术—研究②宗教—研究③神话—研究 IV. ①B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71号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19-6/B.195

定价: 76.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二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英]馬林禰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原著 李安宅 譯述

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譯者序

著者馬林欄斯基 (B. Malinowski) 教授是倫敦大學人類學教授，是人類學的功能派開山大師之一。在譯本當然抹殺了不少的風采，倘將原文與其他同類著作對讀，特別是與美國人類學的著作對讀，則見大手筆煞是與衆不同。然而科學究竟不是文學，即在譯本中知者也可較量短長；知道這樣有骨有肉的論文，是不可多得的。關於著者本人，我不想再多說甚麼話，因為拙譯他底兩性社會：父系社會與母系社會底比較 (原名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譯本係改名商務出版的時候，已經比較介紹得詳細，特別是正反兩面都有。

我在這裏所要說的，乃是這類著作對於國內學術界的可能影響。

我們吃了中外兩種八股的虧，這是誰都知道的。但八股底特徵是甚麼呢？不過是爲說話而說話爲書本而書本，並不會針對了實在界加以直接體驗的工夫而有所對策，所以充滿了腦筋與筆

學的只有不自覺的二手貨，而無創作力量的頭手貨罷了。使我們習而不察的事實，使我們有了因襲的評價的制度與思想系統，都可藉着人類學給我們的比較研究，而立刻分出遠近佈景，立刻使我們添上一種新的眼光，養成一種透視力。這是人類學應該給我們的貢獻。這貢獻，不但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非承受不可；即一切其他部門的學者，打算在這個時代有世界公民的資格，有洞觀內外那樣新國民底訓練，也應該承受這種貢獻——倒不必說這種貢獻給他養成的心理態度，會對於他底專門事業，不管是農工化電還是政教商賈，那種不可計量的間接幫助了。著者說得好：「人類學不只應該利用我們底心理我們底文化來研究蠻野風俗，也該利用石器時代所給我們的遠近佈景來研究我們自己底心理。」

譯者特別關心的，自然不只是讀了人類學的文字而有的可能貢獻。最大的可能貢獻乃在人類學底嚴格訓練教我們所作的實地研究。實地研究，實地工作，纔是針對了八股習氣所下的頂門針。

國內深山遠境未甚通化的初民正合乎人類學底對象，要用人類學的實地研究，不必說了；即

國內一切經濟落後的農村社會與墾殖過程中的邊疆社會，也都不是一般抄襲了近代城市文明的社會學所容易下手。我們不希望對於自己底社會基礎——農村——有科學的認識則已，不希望對於邊疆社會加以開發與鞏固則已，如其希望，則必要腳踏實地的細大不遺的社會學這等不以近代城市文明為背景的社會學，不以西洋工業化的大量生產的農村為背景的社會學，便是譯者心目中的人類學，便也是這譯本所提倡的人類學。

惟其人類學底發源即本實地經驗，惟其社會學底發源即本哲學系統，所以今日切乎國情的學術是用人類學來經社會學之不足，來轉移為學的方向。總而言之，你管這個叫社會學也好，叫人類學也好，只要用力的方向是在適當的軌道上，則是中國起死回生的要圖。倘若我們仍然只是喜歡作空文章，仍然只是抄一抄人家底公式與制度，而不肯實在看看自己甚麼樣，不肯逼對事實來思策應，則外邊多大刺激，內心多少熱烈，也只有曇花一現或至於麻木了自殺了而已。為針砭我們在學術上的積病起見，本行人與外行人都可因實地研究的人類學有所收穫。

我們雖然不關心名辭上的爭辯，也可就着這個機會來說一說人類學之所以為人類學，人類

學之所以需要於中國。

人類學自然與考古學有關，然而我們急待解決的切要問題多得很，在國內提倡人類學的理由，不在它底考古性質，不在太平無事的所謂純科學。這些東西不是沒用地位，不過那是另一問題。這裏只是說，這裏所要提倡的人類學不是因為這個理由，而是因為人類學底動的方面而已。

人類學在歷史發展上，一面與考古有關，一面與殖民經驗有關。英、法、美各國所以發展了人類學，便是因為各有各底殖民問題。因為殖民地底實際要求而有異種文化底研究，這異種文化又偏是經濟落後的，所以這種研究便是人類學。不過美國因為印第安人已被白人圍起來，久已沒有文化怒潮與政治生命線的嚴重問題，所以美國在量上見得到的人類學是偏於骨董一方面；只有小部支流，是關心動的問題，或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自己底文化或生力尚在的社會的。英、法兩國以人類學為殖民官吏的必要課程，所以他們底人類學是充滿了實際的經驗與動盪中的文化線索。我們更不要忘記，墨西哥因為比較的經濟落後，大與中國農民相近，所以一切設施與研究，都是人類學家底事。人類學是研究原始社會的科學，而原始社會便是經濟落後的社會，並沒有旁的意

思。所以用人類學來研究一切經濟落後的社會，是再對不過的——更不說人類學所給的遠近佈景在研究經濟發達的社會所有的助益了。中國以農村為基礎，中國底農村又不是工業化的農村，所以用人類學來研究中國農村正合適，正該加以提倡——更不用說邊疆社會也同樣急切，許多未同化而蔽塞在各處的初民也終需有個時期加以注意了。

這裏應該附帶補充一句的是：人類學除了上述的用途上的分別以外，在對象上也有一點分別，即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是。體質人類學有人體測量一部，因為測量可有數字可記，似乎有科學的尊嚴，所以一般人聽見的人類學不是考古就是人體測量。而且原來的種族偏見，總相信「非吾族類，其心必異」，總以為天造地設「種」是不同的，所以人也歡迎以種為根據的報告。可是體質的測量總沒有多大了不得，不但人之相異在體質者不如在文化者繁而重，即測量本身也有時而窮——都量完了又怎樣？測量的體質人類學是這樣意義不大，另一面的體質人類學乃是以羣或型為單位的生理學，前途雖無限量，可是專門得非一般人所可理解——非生理學專家且兼具人類趣味者不能理解，所以現在一提到人類學，與以前相反，不是體質人類學，而是文化人類

學。我們心目中所要提倡的人類學，便是文化人類學。

人類學所關心的比較，不但中國本身人羣衆多，文化複雜，是極豐富的園地；而且中國已成了各文化底聚會地，在這裏考察文化接觸的現象，適應的過程，變遷的軌跡，推陳出新的可能，在在都足啓發。這不只是我們自身底問題，也必大有貢獻於世界——雖然我們百孔千瘡的現在還談不到那樣好整以暇的態度。人類學所关心的功能，在中國這樣處處需要重新估價的時候，正是要問功能所在，而用不着徒事中外新舊等空名之爭辯。國內文壇上好像對於「中國本位文化」鬧得很起勁。但欲這等問題不涉空虛，不攢牛角，似乎唯一的標準便在文化底功能。合乎大衆物質精神各方面圓滿生活之適應條件者，保而留之，擷而取之，不論古今中外；不合者，剷而除之，拒而絕之，也不論古今中外。但怎樣知道這個合那個不合呢？這不是好惡喜怒的問題，不是「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態度所可濟事的；惟一的辦法，縱然嫌它遠水不解近渴也沒有辦法的辦法，便在「愚不可及」地從事人類學的實地工作——一步一步一項一項地逼視着文化現象而加以分析加以衡量，以使各種文化功能可以豁然顯露的工作。批判的工作是這樣，建設的工作也是這樣。必是

知道了牽動全社會結構的功能所在與反功能所在，乃能因勢利導，乃能有建設效率之可言——因爲建設不是一紙文便可行得通的。

我特別要在這譯本之先談起這樣大題目的緣故，不但因爲我底見解是這樣，可以藉機發揮；尤其重要的，乃是因爲這本書是在直接提倡這種方法。著者在西洋的學術界已是大聲急呼，在素來不重實學，不重實地經驗的中國，更有加緊提倡的必要。中國不實地便罷，不諱人類學便能，我絕不希望中國會有一天走上美國底傳統人類學底覆轍，走上爲寫報告而搜集材料，重量而不重質，變成骨董而無關大體的路子。

實地了，也並不是完全可靠的。我最愛著者這樣一句話：「實地工作也可是頭手貨或二手貨。」我猜想他是針對了美國一般人類學界而發的，因爲他底警告正合乎美國底情形，而且美國也最反對他。他關於實地工作說：「一切的知識都是要因親眼觀察土人生活而得來豐滿，不要由着不甚情願的報告人而擠一滴一點的談話。」

以上說完人類學對於中國的可能貢獻。